

2007卷(第2辑)

VOL.2007

总第4辑

金融评论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辽宁大学金融研究所◎编

Review Of
Finance

■ 白钦先 秦援晋

经济学、金融学的人文特性及其文化阐释

■ 陈雨露

论中国宏观金融管理的全球思维建设

■ 王元龙

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战略抉择

■ 赵锡军 魏广远 李悦

亚洲货币合作的现状、困难与推进策略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金融评论

REVIEW OF FINANCE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辽宁大学金融研究所 编

2007 卷 (第 2 辑) 总第 4 辑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丽敏

责任校对：李俊英

责任印制：尹小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评论 (Jinrong Pinglun). 2007 卷 (第 2 辑) 总第 4 辑/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辽宁大学金融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049 - 4652 - 2

I. 金… II. ①辽…②辽… III. 金融—中国—文集 IV. F83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012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85 毫米×260 毫米

印张 13.5

字数 228 千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90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4652 - 2/F. 4212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主 编：白钦先

执行副主编：张 荔

学术委员会

顾 问：黄 达 赵海宽

委 员：艾洪德 白钦先 曹龙骐 陈雨露

戴国强 何德旭 赫国胜 胡怀邦

江 春 姜波克 景学成 孔祥毅

李仲飞 刘仁武 刘少波 刘锡良

刘 亚 马君潞 秦池江 宋逢明

唐 旭 王 江 王爱俭 王广谦

吴念鲁 张 荔 张 强 张亦春

曾康霖 郑振龙 周建松 朱新蓉

(以汉语拼音为序)

编 委 会

白钦先 丁志杰 (北京地区特邀) 赫国胜

禹钟华 (常务) 张 荔

(以汉语拼音为序)

学术六字经

(代前言)

尊重知识人才	尊崇自主创新
感应时代脉搏	开阔视野胸襟
追踪学术前沿	展示大家风范
遵守学术道德	遵循学术规范
百花齐放斗艳	百家争鸣共赢
严肃严谨严密	宽厚宽松宽容
彰显研究特色	追求和谐共荣
东西南北比翼	古今中外贯通
宏观微观综观	定性定量定格
自尊自立自爱	强国强经强金
切忌唯书唯洋	只知唯实唯学
扶持青年新秀	不拘一格选文
增强民族自信	发扬民族传统
閤放人类文明	服务中华振兴

白钦先

二〇〇六年六月

目录

2007卷

第2辑

1

白钦先 秦援晋

经济学、金融学的人文特性及其文化阐释

21

陈雨露

论中国宏观金融管理的全球思维建设

25

王元龙

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战略抉择

37

赵锡军 魏广远 李悦

亚洲货币合作的现状、困难与推进策略研究

48

陈野华 何德好 文庆能

信用衍生品定价分析

66

曹龙骥 刘廷伟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的约束机制探析

	郑 鸣 肖 健
	中国股份制银行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实证研究
81	——基于代理理论的分析视角

	陈国进 王 景
	IPO 抑价和溢价
97	——基于异质信念的解释

	孙祁祥 刘 涛
116	保险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启示

	王 聪 欧阳青东
133	中国保险业交易成本制度研究：概念和理论框架

	贾墨月
156	从流动性过剩谈金融改革深化问题

	郭万山 刘治松
167	准承诺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沈 军
180	SFE 框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研究思路

206	后记
-----	----

经济学、金融学的人文特性 及其文化阐释

白钦先 秦援晋

摘要：经济学、金融学中的许多错误是习而不察的。比如我们在本文中特别提出金融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对于这一观点并没有人明确否定，但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已背离这个见解甚远，深深陷入技术主义的误区，却没有觉察到。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金融的特性：金融是有历史、有文化内涵、有民族特征的，使“金融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第二部分检讨了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金融学是怎样逐渐丢失人文因素而陷入技术主义的误区的。重点是要说明：在人文学科中，数学是一种根据研究需要而采用的工具，但绝不是人文学科的思维。如果用数学思维代替关于人性和文化的思维，则人文学科将远离常情常理；而如果人文学科的原理得不到常情常理的印证，那么就不能说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

关键词：金融学 人文学科 技术主义 文化

金融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提供思想，但很遗憾的是，当思想有机会变为政策的时候，却常常会漏掉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人文因素。谁也不能说经济学家及金融学家不应该服务于政策，但如果仅仅服务于政策，那么事实上却是荒废了主业。经济学家及金融学家应当用比政策内涵更深广得多的知识服务于政策，他们把这种知识提供出来已经尽了大半的职责，至于这些知识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政策，学者恐怕就不必念念在兹了。如果说经济学、金融学不是简单的政策学，它们提供比政策内涵深广得多的知识又应该是什么呢？本文就是要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将通过对金融特性的观察重新确立金融学是人文学科这个基本观念；第

二部分将检讨 20 世纪在经济学、金融学主流上表现出的技术主义倾向和简单政策学意识,主张让金融学回到合情合理的世界,这个合情合理的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思想能够在人类生活经验中得到验证的世界,也就是人性的世界。

一、金融学是一门人文学科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面对一块石头,你可以用物理学或化学的方法去认识它,因为五千年前存在于高山之巅的这块石头和存在于今天的这块石头没有什么分别,这块石头存在于英国和存在于中国也没有什么分别,石头是没有历史的。但面对人类社会的诸项事物,几乎都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因为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历史和文化,它在历史的各阶段、各民族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试图用科学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这种善意的愿望往往办了坏事,把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束缚于一个共同的定式之下,反而害了人类。切记“多元是福”,研究人类社会范畴的问题必须用人文的方法。

金融学的对象显然不是石头那类东西,它的性质和特征都不是那么稳定不变的,我们就来看一看金融与石头相比有哪些不同特征。

(一) 金融是有历史的

并不是人类社会一经产生就有金融的,而且有了金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早就描述过金融发轫期的状态以及货币拜物教的形成,这早已成为本学科的常识,不需要特别提出来,但许多思想漏洞正是从忽视常识来的。我们今天面对的当代金融与发轫期的金融之间有一条“脐带”连接着。按照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见解: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为现代不过是历史累积而成的一种结果。举一个金融学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性的例子:1910年,德国经济学家希法亭出版了《金融资本》一书(现在世界金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金融学名著),他发现金融之力,特别是信用之力,经过历史的运动已经从生产和商业中脱颖而出,并发展成为一种对生产、商业,甚至对社会关系具有统治作用的力量,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就表现为“金融控制实业”。希法亭正是从金融的历史运动中把握了金融特征的变化;而由于金融的这个变化,致使整个经济的类型特征也起了变化,从实物经济走向金融经济;而金融经济的虚拟化特征又把基本经济风险由萨伊所定义的

“销售风险”推向“金融风险”。回顾这一百年的金融与经济的历史，希法亭以历史眼光指出的这些特征仍然鲜明地存在于当今的世界经济中。但是，也应看到理论界有一种习而不察的误解，那就是把理论的演进看成以新代旧的“排异”过程，而不是看做守旧立新的“共存”过程，唯有大师能够避免这种思想的狭隘。例如，当希法亭强调金融地位和金融风险重要性的时候，他绝没有暗含一个前提，即萨伊的生产中心论和警惕销售风险的思想已经过时，并证明当今世界经济、金融风险和销售风险的确是共存的。人文思想的演变，本质上是一种递进，而且是此一时彼一时地递进。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兴盛起来，“借需求之力拉动供给”似乎是经济学中不证自明的真理，学术界几乎忘记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那些趾高气扬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的思想库中把萨伊定律都给剔除了。30年后，当被视为不成问题的“供给”成为问题，“需求管理”的那套过分的技巧（Overskills这是弗里德曼批评美国凯恩斯主义的用语）开始显得捉襟见肘时，蒙代尔这些新锐派人物便扛起了“回到萨伊去”的大旗，使得以萨伊集其大成的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显学。蒙代尔这些人虽然新锐，但其实他们重述的是一种古老的思想，新与旧，常常就是以这种方式共存的。凯恩斯本人显然并不属于凯恩斯主义者，至少在“排异”和“共存”的选择上他是主张共存的。凯恩斯曾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它多么古老，很少能被消灭掉，至多只可能被淹没一段时间，一旦机缘凑巧，一种古老的思想又会重现光芒。凯恩斯自认他的思想从几百年前的重商主义中得益甚多。

思想只有多元共存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剩下一元来支撑，则既不能为这个万象的世界提供全方位而合理的解释，更不必谈提供应对时事的良策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大智的思想家们却往往忽视。世界范围的经济学、金融学领域正流行着一种习而不察的错误，即趋新弃旧，以时髦之意为唯一确论，不知不觉割断了历史，同时也就割断了新理论的生命。在自然科学领域，新原理、新技术完全可以证明某些曾经流行的旧原理是错误的、旧技术是粗糙的，从而以新代旧，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自然科学进步的一般方式正是如此。但在一切人文思想上，正如凯恩斯所说，旧的很难被消灭，甚至新的也很难说就是独造，共存与递进才是人文学术进步的正途。根据金融学的这个特征，显然其属于人文学科。

（二）金融是有文化内涵的

金融不是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孤立现象，各时代的大文化构成了金融的基本

背景。金融无论是作为思想还是作为行为，都显现着它那个时代的文化含义。金融学如果放弃文化视角，将堕入纯粹的技术主义。文化是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的智慧体，从智性层面看，人类创造了各种生存与进化之“术”，金融无疑属于所谓“术”的一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展示了人类独有的“天性中的交换倾向”，其描述的就是人类的一种广义的金融能力。从慧性层面看，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使人类天性中潜在一种“向善的倾向”，正是这种向善的倾向创造了各种价值判断，以及公平、正义、悲悯这些观念同各种生存之“术”一样古老，甚至更古老，对于人本身的进化以及人类历史的进步，其作用与“术”是并驾齐驱、缺一不可的，唯此才构成完整的文化，人也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金融无疑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人类慧性，即价值判断力的笼罩之下。在金融领域，“术”可以随着人类智力的发达和物质技术的进步而循序渐进地提高，但来自人类的慧性的“价值判断”却似乎早就树立在那里了，它约束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当然包括人类的金融行为。古人常把正义、公平、悲悯这些东西称为支撑起天地的极则，那是“泰初有道”以来就有的，它们本身就是“道”，根本在人性——既良行又良知的人性。这种极则在金融中表现为最坚韧的文化力量，尽管这种极则在一些特殊情形中表现得偏执、不近人情，但人类至今去不掉它，大概也永远去不掉。例如，根据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论认为贷出货币而收取利息是不正义的。这当然是一种来自《圣经》的极端的正义观，作为现代人，我们尽可以嘲笑这种正义观的“极端性”，但实在无法嘲笑正义观本身，因为当我们嘲笑正义观本身时，我们会发现已自绝于具有慧性的人类物种，惘然于自己到底属于什么了。所以，所谓的天地立极的准则事实上是最坚韧的文化力量。古典学派把劳动价值论视为经济学的基石，这就意味着经济学的原理必须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而这对于20世纪的经济学显然是一个麻烦的设置。1947年，萨缪尔森发表名著《经济分析的基础》，称他已经成功地去掉了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石而代之以数理分析，令人麻烦的价值判断问题由此被清除出经济学。萨缪尔森此举尽管数度得到肯定，并且由于他于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使世界经济学界向这个方向趋之若鹜，但如果从经济学思想的历史来看，这又未必不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我们回顾一下古典价值论的精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经济学中的正义原则正是以此立足的。如果古典价值论被取消了，那么正义的原则也就没有了立足之本。设想一下百年后的人们，当他们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包括金融学时，定会惊异于我们的学术中道德力如

此缺乏，就像古典经济学家回顾重商主义时惊异于其中经济正义观的缺乏一样。就单个经济学家来说，要他们对百年后自己的名声负起责任，似乎显得有点可笑，但要求经济学家整体对百年经济学走向负起责任，却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价值判断”是如何被丢失的呢？此事说来话长，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亚当·斯密当年通过法国的葡萄酒和英国的铁器案例展示比较成本学说的原理，笔者相信，他那个独特的发现当时一定使他强烈地感到纯智性的兴奋：完全没有投入更多生产要素，仅仅是分工生产和彼此交换优势产品，双方便都获得了利益，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原理是劳动价值论极为自然的延伸，因为归根结底，它证明的是劳动在分工状态下的效率，不仅无愧于劳动价值论，而且证明了劳动价值论。如果当时有人提出去掉劳动价值论这个根基，不仅可依靠比较成本学说建立起具有普适性的国际贸易模型，而且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把这个数学模型的结果计算到像设计卫星运行轨道那样精确，亚当·斯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因为世界上的道理不能这样孤立地去讲，如果偷偷抽去一国国民福利和国家利益这些属于“价值判断”的概念，把国际大分工推到极端，则这种理论不仅没有思想的卓越性可言，而且无疑是在为强势国肆意剥削弱势国国民的劳动、剥夺弱势国自然禀赋的资源进行相当无耻的辩护。在亚当·斯密理论出台一百多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伯特尔·俄林对国际分工和交换进行了相当完整的技术性分析。伯特尔·俄林认为，国际贸易的理由在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如果各国都生产本国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则各国均将得益，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因为国际贸易也将趋向于合理。这个原理被萨缪尔森加以完善，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正统理论，即萨缪尔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这个模型中被悄悄抽去了“价值判断”，精致的模型背后是智慧的平庸和空虚。他们的前辈李嘉图在分析“比较成本”时，却并不认为完全的国际分工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民族感情”问题横亘其间，而且李嘉图曾说，他个人是不希望看到这种感情淡薄下去的，证之历史，萨缪尔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也是得不到支持的。例如，在美国立国之初，那片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就是美国最优越的自然禀赋，按理，美国最适合发展成为一个农业大国，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也曾这样设计过美国，但财长汉密尔顿却认为，美国若主要发展农业将不可能有雄厚的国力，国民不可能有优越的福利，美国将成为欧洲货，特别是英国货的大卖场，若没有属于自己的先进制造业体系，也就不会有独立的军事和国

防，那么美国在政治上的独立恐怕也难以坚持下去。汉密尔顿所坚持的“价值判断”的内容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前提条件，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前提条件，宁可不进行国际贸易。正是从这种反完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出发，汉密尔顿提出了《美国制造业发展方案》。在保护主义旗帜下，美国按照这个方案埋头发展一百多年后，终于趁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衰落之际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强盛史否定、抽除了“价值判断”的萨缪尔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而当今握有话语权的美国和英国却用这个没有价值判断及历史内容的模型蛊惑众多弱势国加入它们主导的国际大分工，我们想一想，富于智慧的人类思想是不是已经沦为辩护的工具？没有文化内涵的经济学、金融学就是这个样子。

（三）金融是有民族特征的

前文已经说过，文化是人类的智慧力，可以从“智”的层面和“慧”的层面分别看。对金融而言，“智”的层面即金融之术，各个民族的一致性是很高的，既都能够独创，也可以迅速地学习模仿；但在“慧”的层面，各民族却有自己坚韧的特征，受大文化背景的影响，很难模仿学习，甚至没有必要去模仿。对金融的民族特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从深层到浅表层依次为民族文化、制度特征、民族位势和一定时期的经济目标。当然，这也只是大概言之，详细的划分还会呈现更多层面。

民族大文化背景是形成金融民族特征的最顽强的因素。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黄晓光先生曾说，盎格鲁—萨克逊人和中国人是世界上两个最有金融天分的民族，所以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都是由这两个民族的人在唱主角。我们就以这两个民族为例进行分析。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从9世纪起就生活于现在所称的“英伦三岛”上，他们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受天主教教义的限制比较少，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立的国教——清教。清教精神就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它的特征是勤劳、诚信、节用、爱人。欧洲大陆的天主教认为，人要能够进天国，就必须把俗世的一切敬献给天主，而天主在人间的代表就是教会，所以一个人在尘世可以毫无品行地活着，只要临死前把财产捐给教会就可以换取一张进天国的入场券，此谓赎罪。教会的神职人员逐渐地有意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聚敛财富，如销售“赎罪券”，把财富往教会聚敛。马克思曾说，神职人员是一个不生产的阶级，他们把聚敛的财富用于奢靡的消费、建筑豪华的教堂等。有一些

人，他们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弄到钱，买到了“赎罪券”，在上帝那里先报了到，就在尘世余生中无恶不作起来。这种行为败坏了当时的风气，腐蚀了许多人的品格，一般规矩的平民是看不惯的，于是便有马丁·路德出来，声明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不需要教会来作介绍人；上帝的赏罚，根据的是一个人一贯的品行，而不是他的顿悟忏悔和他所献给教会的财富多寡，是为新教。新教流行于今天的德国、荷兰等地，具有教人勤劳、诚信、节用、爱人的文化特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与岛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清教精神就一致起来了。这些受新伦理熏陶的平民在城镇经营手工业，靠勤劳积累起财富，现在不必再把这些财富献给教会了，那么财富用来做什么呢？既然上帝是以人一惯的品行来决定该人能否进天国的，他们也就不能把这些财富花天酒地地消费掉，因为那样一来在尘世忙碌几十年最后也没讨得上帝欢心，上帝喜欢吃苦爱人的。于是他们便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扩大生产，使镇上的闲人们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经营不断扩大，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组织准备工作完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在这种伦理精神笼罩下兴起了。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一番道理：新教伦理为什么产生资本主义或欧洲资本主义为什么兴起于新教地区。细察这段历史，近代欧洲金融也是兴起于这一地区，而且带上了强烈的新教伦理的文化色彩，英国和荷兰最早产生近代银行制度并非偶然。虽然类似于银行的机构很早就有，但信用制度的发达才是银行成长到近代的主要特征。英国、荷兰商人们的卓越之处并不在于较早兴办银行（因为公元两千多年前在古巴比伦的商人中就已经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币经营的人，即银行家），而在于他们创立了近代信用制度、创造了各种信用工具、扩展了授信范围，使信用规模达到可以满足近代工商业发展规模所需要的程度，如英格兰银行、斯德哥尔摩银行，就是最早使用汇票和信用证的。如果没有文化伦理中的诚信精神，则近代银行及其信用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美洲的开发，几乎完全得力于这些新教教徒。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洲的第一批殖民者差不多都是清教徒。通常以为美洲开发靠的是冒险家的强占和掠夺，这是从欧洲贵族的客厅中产生的历史谣言，美国史学家毕尔德在他的巨著《美国文明的兴起》中公正地指出：美洲开发是那些习惯了在土地上勤劳耕作的英格兰男男女女的成绩。他援引当时一位旅行者的话：那些男人和女人像他们的马一样辛劳耕作，拖着犁耕种。在拓荒中，他们原有的清教徒勤劳、诚信、节用、爱人的品格进一步得到砥砺。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美国精神的根源。

三 清教文化给美国金融深深地打下了民族特征。从银行体系看，以社区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小银行构成了美国金融的基础，尽管汉密尔顿等政治家努力建设国家大银行，但若没有众多小银行汇成为浮起国家经济的“汪洋大海”，国家大银行事实上是不能够从容就道的。在这些小银行身上，映现着清教文化的诚实守信的精神色彩。文化也影响到金融制度建设。在美国立国之初，法律上是不允许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从文化意义上看，这是为了使银行更好地履行本地化互助服务的职能，使本地银行与本地工商农业间的互助达到小圈子中的和谐，这就是清教精神的体现。所以，可以说以清教精神为根底的美国文化事实上是不鼓励扩张的，但美国的银行中有一部分却走上了扩张之路，这是制度的机制使然。虽然法律不允许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但并没有明文限制跨国设立分支机构，所以有些银行便利用家族和乡亲关系把分支机构设到欧洲的老家。正如霍桑所言，美国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一般人在感情和习俗上仍然怀恋欧洲的“老家”，这种普遍的民众情感影响着当时的美国经济和金融。有些更富开拓性的银行甚至到欧洲以外设立分支机构，如花旗银行，它在国外的第一家分行居然设在中国上海。但大多数银行仍然安于本州、本区，与当地工商农业之间结成稳定的联系，百年不易，这是美国经济的真正基础，至今如此。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当银行跨国经营成为风潮时，谨慎的金融学家则警告银行家们冷静下来，不要无条件地认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的平庸智慧。“小的是美好的”，社区银行应当坚守自己的文化特征，稳健经营，不要盲目重组以求大，事实上，坚持稳健传统的小银行，其经营风险远远低于跨国大银行。

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化传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并融进自己的“血液”，形成了所谓的儒、道、释汇合的文化格局。若从商业与金融视角仔细审视，我们可以发现，道与释两家对于商业与金融发展提供的文化助力较微小，中国金融的民族特征主要是由儒家文化造就的。

儒家造就了中国民族金融的哪些特征呢？从我们确立的视角可以看到以下两个非常明显的方面：一是儒家“爱有等差”的文化理念造成了商业金融的家族性特征；二是儒家特殊的义利观造成了资本与劳力共享成果的金融制度和仁智合一的儒商精神。

儒家认为人的爱是有等级之分的，人皆“亲其亲，子其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没有博爱精神，博爱是次一级的爱，是“亲其亲，子其子”之后行有余力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特点，孟子表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即他人的老与幼固然也是我爱护的对象，但这必须在爱护我自己的老与幼之后。这个文化理念渗透于商业和金融，便形成了中国工商金融机构很强的家族性，特别是在创业阶段，风险程度不确定，一般皆由家族或亲族合作共力，俗语“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商业上表现为合作共担风险。从表面上看，西方近代早期也多有家族性工商金融企业，如意大利著名的梅迪奇金融家族，但造成西方家族性企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文化，而是制度设计，如长子继承权使企业在家族的子孙后代间完整交接，不至于分割离析。如果追究文化背景，西方一贯的理念是“人皆上帝之子”、“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博爱思想只有淡薄的人皆“亲其亲，子其子”的意思，因而不易造成家族性的工商金融企业，这与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的情况明显不同。这种文化差异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无关紧要，事实是文化土壤深深地影响着其在商业与金融上的“果实”与“花朵”。以山西票号为例，山西票号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古典银行，票号的兴起是由商业家族之力促成的；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也是各个商业家族竞相仿效的结果。但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中国金融一支“奇葩”的票号也正是垮在其家族性上。到19世纪末，外国银行如英国汇丰、俄国道胜、日本正金等银行登陆中国主要口岸，且向内地深入，称雄一时的山西票号岌岌可危。当然，这种危险并不是一夕突至的，其实当时组建中国本土大银行的呼声早已屡见报端，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山西票商自己也感到有组建大银行的必要，以免被外国银行各个击破，但家族性使每个票号的对外合作均十分困难，虽然目光远大的李宏龄奔走于各大票商之间，但大家对他都虚与委蛇。李宏龄参考西欧、日本各国的银行制度，提出了以下重组方案：由每个票商出资3万~5万两白银，再广招社会资本，合成500万两白银作为股本组建大银行；各家票号仍单独保留自己的机构，独立经营，万一有个别票号失利，则共建的大银行有出资救助之责。如此下去，票号制将逐步转型为近代银行制。各票商对这个方案均未表示反对，但就是各怀鬼胎，议而不决。又加上李宏龄力主曾在日本任领事、深谙银行制度的渠本翘担任首任经理，各票商便怀疑这是大家拿出份子钱交给别家人玩，因而决定不入这个圈套。如此拖延下去，拟议中的汇通银行终于只留在李宏龄的纸面上，待到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山西票号果然被各个击破，很快票号（即中国的古典银行业）就整体覆没了。我们再深入思考，中国古典银行业的整体覆没与中国海军经“甲午海战”而全军覆灭几乎就发生在同一时期，这大概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设想票号如果处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之下，没有如此强韧的家族性，那么在

面对共同的强敌时，大概会在各自利益的均衡点上迅速联起手来，同仇敌忾，经过这一场共同的抵御战，票号制大概也就成功地过渡到近代银行制了。但这只能是一种设想。文化总像是一种宿命，促使民族金融业发展壮大的是它，导致其覆没的也是它。一个国家的民族金融总是摆脱不了文化的宿命，这个“百变金刚”总是要幻其身、变其形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一百多年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制实质上不过是家族制的变异形式，更糟的是，除了家族制固有的弱点，它更把家族制的狭隘责任感变为不负责任，一人说了算或一个集团说了算，率尔决策，许多历史性的毛病又转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问题继续存在，成为今天改革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改革的重点与其说是引进先进，不如说是把民族文化优秀的方面发扬光大，同时转换其陋劣的方面，使其不致危害当代的国家生活和国民生活。若从文化视角切入，金融改革在山重水复中似又能看到柳暗花明的新境界。这是后话。

再说儒家的义利观。从文化含义看，儒家义利观是最符合人性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其他文化，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中国土产的墨子、道家，都未免走极端，把义利看成水火一般的对立，儒家却不如此，儒家贤哲很早就表达了义与利的辩证关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作为人，他想利己，这是人性使然、天经地义的，不仅应当肯定，而且应当鼓励，但条件是必须以“义”的方式取得自己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商业与金融的准则。比较本文前面曾引的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那种把一切放款取息的行为都视为罪恶的观点，儒家的思想当然是更人性化的，即使是今日的西方，其商业与金融的文化也尚未达到如此通达的程度。说到在一个国家中的一般国民生活，孔子又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就是说，国家的目的是为国民谋福利的，作为国民，在一个有道之国，如果不能富贵，那么问题出在国民自身，因为他没有获利的劳作和能力。而在一个无道之国，如果国民富且贵，那么问题也是出在国民身上，因为在无道之国大概只能靠不义的行为获利。这也是对中国传统商业与金融进行文化判断的一个准则。兴于无道之国不义之时的商业与金融，一般来说总是有那个时代恶劣的方面，中国近代官僚金融资本的形成即是一例。

义利观在金融制度层面造就了意义深远的“身股制”。我们仍以山西票号为例。商家经营票号为自己获利是天经地义的，孔子以来的儒家一直认为这种动机和目的没有在道德上进行追究的必要，因为它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如果追